从“阴阳”到“性别”

——现代中国“性”概念的缘起与价值观的转向

王 燕

【摘 要】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自译或合译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知识,其关于两性的词汇仍然借用“阴阳”“男女”等汉字,影响有限。甲午战败,严复开始了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严肃译介进化论和其他西方学术的过程。国耻催生了新话语。庚子之后,借用日本新造的“性”和与“性”相关的一系列词汇,知识分子全面引入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新词汇又催生了全新的价值观。“性”概念的诞生标志着儒家文化的男女观向西方科学生理观的转变,也标志着以家庭、宗族为本的价值观转向以个人和民族国家为本的价值观。狭义化的“性”概念到20世纪10年代末已经稳定,它固化了两性性别差异,规训了身体,成为五四现代科学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民族进化论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五四科学狭义化的表现之一。

【关 键 词】性;性别;进化论;优生学

【作者简介】王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200241)。

【原文出处】《史林》(沪),2016.6.193~204

西汉以降,具有等级性的“阴阳”“男女”等表达两性的概念逐渐成形。[①]班昭《女诫·敬慎》曾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②]这一区分直到盛清时期仍然盛行,为陈宏谋的《教女遗规》采录。[③]虽然每个时代、每个阶层的“阴阳”“男女”观不一,但主要通过以对方为参照的、具有差异性的行为维持男女之别。并且,行为差异发生的场域主要为家庭,以便突出人在家庭中的角色,或者为家庭所做的贡献。虽然中医文献也区分男女的生理差异,并意识到了几种“非男”“非女”的存在,但只要他/她能延续父系家族,例如男子通过立嗣,女子通过允许纳妾,维持男女在父系家庭中的行为差异,他/她都符合儒家文化意义上的“阴阳”“男女”。明朝某士子哺乳以抚育幼侄,是因为他孝顺有德,延续父系家族,突然而至的哺乳行为不会影响他继续承担男子的角色,也不会损害他在家族中的位置。[④]同样,被称为“石女”的女子因为天生缺陷,不能完成妻子的责任,也不能生育,但只要她专心服侍舅姑,并无过错,则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她从家庭中剔除,她的责任可以由妾来完成,并不影响她的“妇人”身份。[⑤]完成为人子女、夫妇的角色,才符合阴阳、男女的标准。只有那些被弃于家庭之外的人,才有可能阴阳难辨。

而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生理科学和解剖学的发展,西方逐渐抛弃了女人是男人的不完全发育形态的看法,把两性观建立在性生理的二元对立之上。一个人的性别“sex”是根据他/她的独特性器官来决定的。[⑥]20世纪20年代以后,欧美人又认为,性别不是靠性器官决定,而是靠内分泌、性激素决定。[⑦]等到染色体学说成熟,又认为性别由性染色体决定。在这样一套理论体系中,一个人的性别与其家族位置无涉,只和个人的生理特征相关。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两种文化在盛清之际并行,互不干扰。即使有传教士把西方解剖学、生理学的内容带入中国,也并没有激起多少涟漪。中国的家族本位制度仍然牢固,翻译著作也没有创造出数量可观或者影响巨大的新词汇。一直到晚清咸丰年间,西方的这一套理论在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仍然借用了汉语中原有的语言,并没有创造出超越儒家文化逻辑的新词汇。比如咸丰初年合信撰写的《全体新论》,详细介绍了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在谈到人类的生育功能时,用"男子""阳经"来概括男性的精液制造、储存,用"女子""阴经"来说明女性的阴道、子宫。[⑧]

这样一种平和、平行的文化传播逐渐被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所打破。甲午之后,亡国迫在眉睫。中国知识分子全面代替传教士,主动向国内输入西学。1898年,在维新士大夫中早就流传的严复《天演论》正式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初版。一时洛阳纸贵,群情激动。《天演论》如醍醐灌顶,恰在此刻回答了"中国该怎么办"的疑问。虽说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已经阐述过他的思想,但《天演论》系统地意译进化论,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认为世界上的所有动植物都要经历"物竞",才能被"天择"。中国想要走出亡国的悲剧,必须让每个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开启自己的智慧,变得更有竞争力。严复把每个中国人和整个中国族群放到了西方生物学的理论中来评判。这一评判影响深远,它不经意间打破了中国依靠血缘、家族和地域网络组成的儒家秩序,代之以西方科学生物学的评判标准,把每个人都放到了生物进化论的放大镜下来审视。此时,距离新文化时期"赛先生"的提出还有十多年,但《天演论》是西方科学成为显学的转折点。从戊戌到五四,"性"概念诞生,并借着"科学"的话语成为新文化运动剥离家族主义、崇尚民族进化论的利器。"性"概念撬动了五四价值观的转向,但此概念本身具有狭隘性,它建构的异性生理"性"观既是五四的成就,也是五四的硬伤。

一

在文言文中,本没有"性别"这个词。"性"一直有两重意思。一为"天性""本性""人性"等意思。比如,"食色,性也"。若与英文相对照,大约相当于"nature"的意思。二为"属性"之意。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也就是说,每一种不同属的物品都有其各自不同属性。这两点和现代汉语中的"性"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汉语中的"性"除了原有的两种意思之外,还加上了一个常用的、但是很暧昧的意思——男女或雌雄的特质,亦指性欲。[⑨]因此,"性"的现代定义可以归纳为:生物体有关生殖的器官、生理或者心理活动,以及一切与其相关的特质,类似文言中"色"或"肉"的含义。"性"和"别"字联合,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表达男女不同的中性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再常见不过的词汇。

"性"和"性别"概念在近代中文中形成并广泛使用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现代汉语中大量的合成词汇都来自于近代中西方文化互通、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性"和"性别"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指出,"性"的现代用法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这一看法近些年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肯定。[⑩]但在"性"概念输入和传播过程中还有几个方面没有弄清楚。它是怎么从日本借用过来,如何传播的?"性"和"性别"都是日本来的吗?这一概念进入中文语境后,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性"概念的输入有什么用处?这些都值得再探。据笔者愚见,目前有几位学者有关"性"概念缘起中国的研究较言之成理。一位是翟本瑞,另一位是乐怀璧(Leon Antonia Rocha),还有一位是宋少鹏。翟本瑞仔细考察了中国人"性"观的兴起,认为通"色"的"性"开端于清末民国一位保守士绅叶德辉的《素女经·序》。乐怀璧则极为出色地梳理了"性"这个汉字如何在明治末期从"人性、本性"逐渐拥有了"色"的涵义。在20世纪之前,日文中的汉字"性"有多重涵义,其中以"性质""本性"等涵义为主。而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sex"的新涵义开始更加流行。这在日本的各种字典上也能反映出来。[⑪]宋少鹏较为仔细地梳理了"性"的几种现代含义,并提出20世纪20年代是"性"的现代含义被广为接受的时期。她同意汤尼·白露(Tani Barlow)的看法,认为和"性"一起进入中国人概念的是一种科学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思维，这和“妇女”“女”等代表的意涵完全不同。笔者较为肯定宋对“性”含义的判断，但认为现代“性”概念传播在1920年前已经蔚为壮观。再者，笔者认为科学思维的发展与“性”概念的崛起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并未和它捆绑。总体而言，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妇女”“女”和“性”等观念已经广泛地拥有了“群”属的意义，并都和生理学、解剖学为代表的科学挂上了钩。无论是“妇女”、“女性”还是“男性”，都是本质主义的个体。[12]“性”概念知识体系完成了对个体认知的改造，也开启了对社会的改造。

在日本，医学是传播“性”概念的核心领域。据乐怀璧研究，虽然不是很清楚谁首先使用了“性”，但日本的西医首先开始使用“性”的新用法，这是很可信的。森鸥外(1862—1922)是日本近代讨论性问题最多的作者。他19岁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是日本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年轻的医学士。他后来担任过陆军军医，并在德国留学学习公共卫生。1902年左右，他利用他的医学知识广泛地向民众传播有关“性”的卫生知识，并在文章中通篇使用“性”的概念和各种复合词。他认为性欲是人性发展的重要动力，压抑性欲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弥补的损伤。[13]

鲁迅的医学讲义也颇可说明医学是日本“性”概念发展的重点领域。根据鲁迅的回忆，1904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师从藤野先生学习时就发现，日本的医学发展史最先从引进中国的西文翻译开始，后来才有日本学者直接从西文翻译。鲁迅深得藤野厚爱，由老师帮助修改了大量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虽然丢失，但鲁迅对它们印象深刻。1909年他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期间，编写的生理学讲义就是基于当年的学习。在这份存留下来的讲义中，可以看到，鲁迅所用的是当时日本一套比较成熟、完整的生理学讲义，这套讲义和晚清咸丰年间的《全体新论》有着相似的框架，而且和1903年前后商务出版社翻译编订的一批生理学教科书在章节编排上也非常类似，都按照骨、肌、皮、消化、呼吸、循环、排泄(泌尿)等顺序排列。其不同点在于，商务出版编译的教科书并不含有“性”的新用法，而鲁迅由于认真学过日本的西医，所以照搬了这一概念。他在1909年的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教》中专辟最后第二章讲述了生殖(Generatio)系统。虽然其他章节兼用了“男子”“女子”的说法，但在生殖专章中特别用到了“男性”“女性”：

附：mammae。此之位置，在匈骨左右，第三至第四肋间，比至成期，乃顿发达，顾女性为尤著，状约半圆，中央具一突起，谓之乳头(Papilla mammae)，周围有色素沉着，是名乳腺构造。

滤泡既裂，Ovarium之膜随之，而Tuba uterina之剪彩，时乃向Ovarium，以受其Ovum。又因管壁之幺，具有颤毛，故赖其运动，得至Uterus中，受尽发育。设其不尔，则遂死亡。Fecundation此之成因，由于媾会，射尽而后，男性之Spermatozoon，乃在孳殖官之一处，与Ovum遇，贯入于Uterus，尔时Ovum之膜，突然增厚，形素亦忽收缩，用拒其余，使勿更进……[14]

这一章中，鲁迅保留了大量的英、日专有名词，也许是因为这个话题对当时的中国学生还太敏感，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中文翻译。但从中可以看出，“性”概念是日本医学领域有关生殖问题的专有概念。其他地方或许还可以用“男子”“女子”或者“雌/雄”“牝/牡”代替，人类的生殖医学却未必。

“性”概念从日本医学界辐射出去，进入了许多新的领域，不过对它的使用相对缓慢、有限。甚至在近代最重要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著作中，也只是浅尝辄止，部分使用。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震动了欧洲的指导神学思想。其中的第四章“Sex Selection”专门阐发了他观察到的自然选择导致的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15]很快，各国出现了各种翻译本。日本最早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出版了立花铣三郎的《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译本。这个版本在翻译“Sexual Selection”时，采用了“雌雄淘汰”的译法，虽然章节里偶尔使用“雄性”“雌性”“两性”这样的字眼表示对西文“Sex”的理解，但标题却没有使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用“性择”。[16]1905年,第二个日译版本《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出版,但译者丘浅治郎沿用了立花铣三郎“雌雄淘汰”的说法,并和立花一样偶尔使用“雌雄性”。[17]

除了推介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外,“性”概念也逐渐辐射出去,为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大众所熟悉。从福泽谕吉等精英到日本的媒体大众记者,都开始使用“性”来表示一种本质主义的生理特征,或者肉欲。福泽谕吉在他的名篇《男女交际论》中就采用了这一概念。而石川半山这位日本近代的著名媒体人也面向大众推广了“性”。由于这和中国的“性”概念接受史密切相关,将放到下文中讨论。

二

“性”概念虽然发端于日本的西医领域,但随着其辐射范围的增加,等到中国接受此概念的时候,却主要出现在最具先锋思想的报纸媒体上。中文中目前能够看到最早出现类似生理意义上的“性”是在1900年。《清议报》上刊登了日本一位名叫“石川半山”的人写的《论女权之渐盛》。这篇文章的具体译者是谁,不得而知。石川半山当时是《每日新闻》报的一名非常活跃的记者,“当世人物评”专栏作者,对各种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也比较敏感。

《论女权之渐盛》一文开宗便说:“人有男女,时如胶漆,合为一体;时如火水,迭为仇雠。古来两性势力,从时舆地而异。”[18]这里的“两性”,明显所指为“男女”两性,意思类似现代汉语中的“两性”一致。从其后文来看,也主要是在描述世界各国男性和女性权利地位的异同。但全篇文章除了这一处使用“两性”以外,并无类似用法,而多以“男女”来表示。

其实,福泽谕吉的一篇《男女交际论》虽然发表更早,且多处涉及“两性”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却全被改为“两生”。[19]翻译中保留了“性”作为“性质”“本性”的用法,却把和石川半山类似的“两性”用法都取消了,看得出译者对“性”的说法尚存顾虑。而福泽谕吉这一名篇到了1907年再次翻译发表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保留了“两性”的用法。[20]

笔者查阅《清议报》主编梁启超在1902年前的文字,发现即使他在日本多年,已经较为熟悉日本的新媒体和新词汇,他也没有主动借用过“性”的新概念。在他毕生的文字中,梁启超都倾向于使用“男女”“阴阳”一类词。近代中国第一份鼓吹女子教育的报纸——1898年的《女学报》和1899年陈撷芬开办的《女报》以及1902年后继的《女学报》通篇全部都使用“女子”“妇女”,未见使用“两性”。1899年,单士厘跟随丈夫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赴日本旅居。单士厘本人很有语言天赋,赴日没多久,就学会了日语,甚至可以兼做翻译。她对日本的媒体报纸很感兴趣,还极为关心中国妇女的教育和平权事业。但她也未在其描述日俄旅程的《癸卯旅行记》中使用过“性”的概念。因此,至少在1902年底之前,“性”概念的新用法在汉语中出现只是昙花一现。

1903年是近代女权主义发展的重要时刻。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和在江浙成长起来的一批激进人士,开始最大限度地宣扬女权。“性”概念在此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前一年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的胡彬夏在东京成立了共爱会,要求男女平权。同时,身在上海的金天翮在宣传女界变革的檄文《女界钟》一书中,正式使用了“女性”“两性”等说法。男女两性的平权问题为“性”概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 异哉!中国普通人民,有一种之**特性**,吾可执此以证女界之必发达者非他,则**女性**是也。法兰西之历史家有言曰:“自法以北之民族,盖杂**女子性**于**女性国民**中,故妇女独得显著之地位。”**女性**者,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之翕合,姿势之织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着,皆是也。向者吾国民常得**女性**之良,今者得其劣。综合而观之,则皆**女性**也。观其濡染于**女性**之深,而知女子之感化力之大。则异日女子,必立于显著之地位,盖无可疑也。[21]

这段引文中,金天翮六次使用了“女性”。但细细考究之下,金天翮的“女性”只是一个复合词,它所指称的是“女子的特性”,即引文开头的“一种之特性”。文中具体谈到了什么是女性,即“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之翕合,姿势之织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着”。只有一处“性”的用法有可能是“属”别的意思,即文中引用的法兰西历史学家之言:“盖杂女子性于女性国民中。”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金天翮作为一个鼓吹女界革命的激进分子，虽然在出版《女界钟》之前未去过日本，但他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早就浸淫于西学中，对于梁启超所办的报纸很熟悉。1902年至1903年间又与从日本归国的邹容过从甚密，还资助邹出版《革命军》。金天翮非常可能从梁启超和邹容两边获得了"性"的用法。虽然他在行文中还混用了"性"的"属性"用法，可证明"属性"的含义仍然大有市场，但作为一个组合词来说，已经跨越了一大步，科学"性征"的含义已经呼之欲出了。[22]

"性"字义的第二次比较大的发展和"色"相关。台湾学者翟本瑞根据考证，发现1903年思想保守的湖南士绅叶德辉从日本引进了并出版了中国失传已久的古代性学、养生经典《素女经》。此书在日本近代被归为医书一类，因此被认为是"性学"著作之一。叶在《序》中接受了"性学"这个概念："如《春秋繁露》《大戴礼记》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似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耶。"此"性学"，毫无疑问是指称"男女交合"等现代意义上的"性"，也即"色"的意思。[23]但叶德辉的序言未发表在报纸等现代传媒，故影响可能不大。

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字典》值得一提。在他的字典中，"gender"对应了"性"。"gender"作为名词的词条解释有二：1.男女或雌雄之别。2.属，性(字中指"男"字"女"字之别)；as the masculine gender，男性，阳属；the feminine gender，女性，阴属。[24]颜惠庆早在1895年就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求学，并以相当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他对英文词汇掌握相当有信心，但是，许多翻译仍然要靠他自己去琢磨。有关"gender"的对应中文应当是他受当时的中文词汇影响才翻译出来的。

这一时期的"两性"用法，由于缺乏对概念的解释，内涵相当模糊，往往只是新瓶装旧酒，沿用"性质"的旧义。比如，1907年，何殷震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天义》报上发表。在她的笔下，她开始使用"女性""男性"，并把它们作为她全面批判的分析范畴。《天义》是在日本出版的，何殷震此时也在日本，与日本读者和学界有交流，所以她应该是从日语中借用了这个词语。但她虽不否认"女性""男性"含有身体的区别，却极力反对把后天的男女之别建立在身体的区别之上，因此她更倾向于"性质""特点"的旧义。[25]另有一例：1909年9月11日，《申报》出现了一篇论说《论近日教育上急宜改良之要点》：

> 况教育者不当仅规规。于个人之**特性**已也。尤当区别于**男女上之两性**。男子则恒富于知而意识较强。其个性别各有不同。然往往以胆汁质为多而黏液质为少。其任事则最善进取。故宜闻国事。女子则恒富于情而意识稍弱其个性虽未免互殊，然往往以神经质为多，而多血质为少。其任事则最善保守，故宜主家政。[26]

文中此处用到的"两性"，仍然是指两种特性。男子有男子的特性，而女子有女子的特性。所以作者借此提醒教育界要注意到男女各有其特性，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教育。总体而言，早期"性"的用法比较模糊、零散，不成体系，也几乎不见对它的理论阐释。

在"性"概念的接受和传播史上，杜亚泉这位近现代中国科学知识的传播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甲午之后，杜亚泉放弃传统科举仕途，转而研习算学，在算学精进后，又自学了物理、化学、矿学、动植物学等等。1898年，杜亚泉与戊戌变法后返回绍兴家乡的蔡元培交好，两人来往极为密切。蔡元培在绍兴的中西学堂中引进了日语教师，杜亚泉首次学到了日语。他开始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杂志，他可能由此获得了"性"这个新概念。由于蔡元培这层关系，杜亚泉后来被推荐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理化数学部做主任。这对他以后传播"性"概念至关重要。[27]

据目前可见，杜亚泉首次使用"性"是在1909年。他早期创办的化学知识杂志《亚泉杂志》上并没有使用过"性"概念。1909年，他以自己的本名杜炜孙在《东方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理科小识：雌雄性分别之原因》。杜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雌雄之分，他只是介绍了各种古已有之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解释认为，雌雄性由生育双方的强弱所决定，或者由营养的多寡而决定，等等。杜觉得这些解释彼此冲突，但又充分说明了生物界雌雄异态的微妙和复杂性。在其行文中，杜已经明确使用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了“雌性”“雄性”“男性”“女性”的用法。其“性”已经拥有了“性质”和“sex”两种含义。例如：

战争之后，多生男儿。俗说以为男儿既多战死，故天多与之男以调剂之。巴里罗谟博士谓，夫妇之中互保护其虚弱者，以传其**性**。

昔埃及之一部落，其土民间起战争，胜者掳敌妇五百人役之，其后生子。得女四百零三人，男七十九人。盖因其妇为俘虏，身体疲弱，故保存其疲弱之**女性**也。

就以上各条观之，不少互相矛盾之例。如二三四五六各条，皆谓女性之体力强则生女。而七八九条所言则反之。大致就外界之境遇言，则食料丰富，可以长养子孙，则多生女性，以期繁殖。若食料缺乏，则须亟谋生计，从事移殖，故多生**男性**，以资操作。[28]

不过，杜亚泉的这篇文章虽然自称为“理科小识”，仍然没有提供什么生理学的“科学”的解释，相反，只是一些粗浅的假说。真正丰富他的“性”概念的著作是他从1907年与其他一批学者开始编纂的《植物学大辞典》。这项巨作持续了整整12年，到1918年正式出版。加上稍微晚几年开始编纂的《动物学大辞典》，随着他的工作渐入佳境，他对“性”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1911年杜执掌《东方杂志》，并再次使用“性”概念撰文，他的底气更足了。《论蓄妾》一文中，杜亚泉批评中国的蓄妾制度加重了已有的男女比例失调。“盖男性者，不得女性之调和，其性质易陷于躁妄与暴戾。……男性女性之分配不均，其极必至破坏社会之和平。”在这里，杜的“男性”“女性”说还部分掺杂了“性质”的意思，但紧接着，他的“性”完全丢弃了旧义。他从近代科学的角度探讨蓄妾制度的不合理，列举了19世纪达斯马尼(Tasmania)人种的消亡，他认为人种的存亡取决于身体和道德。身体体格之强健、“知德之进步”是“人种改良”“民族发展之符”。蓄妾过于消耗“性欲”，不能发达体格、道德：

故保种之道，首在节制性欲。盖吾人之身体，大别之为营养机关、运动机关、智识机关、**性欲机关**之四部。**性欲机关**之使用过甚，则他机关萎缩，而传其不良之形质于子孙。灭种之由，即在于此。……[29]

这一观点乍看和《素女经》的思想类似，都强调消耗男子的精气，会使人折寿，但其背后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道家的“节欲”思想旨在个人养生，指导传统男性士绅如何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健康。而杜亚泉的“节欲”之说，针对的目标人群虽然也是士绅阶层，其目的却不仅仅是个人健康，而是建立在个人体魄健壮之上的种族强健。其次，《素女经》来源于本土道家思想，而杜亚泉的思想并非来源于中国本土，主要依据的是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他的“身体四大机关”生理学理论来自美国的一位医学博士“斯配利皮楷氏”，而“传种”“灭种”思想则来自于达尔文、斯宾塞以来的进化论。其三，《素女经》没有一种文化紧张感，而杜亚泉的跨文化文本，显示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紧张，那种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不进化则灭亡”的恐惧感。从严复以来，形势日趋严峻，虽然进化论带给了知识分子一线希望，但如何将个人的发展与种族的进化结合起来，“性”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它既与个人关系最密切，也和种族问题最挂钩。在清王朝的最后一年，身体的“性”科学被杜亚泉描述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之一。当然，他心目中的“性”和“性欲”，其对象都是以“传种”“生殖”为目的的异性“性欲”。

《东方杂志》在清末的影响极大，杜亚泉的这些思想也通过《东方杂志》传播给了大量的知识青年。这期间，他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频繁使用“两性”“单性生殖”“雌雄性”等词汇，并用具体、清晰、严谨的图像来展示不同性别的动物生殖器官。[30]这两本大辞典在中国科学史上意义非凡，整个20世纪的动物学和植物学都受其影响。虽然杜亚泉后来对他所介绍的西方现代性充满警惕和反省，但他传导的本质主义的“性”这个现代概念已经广为传播并被接受了。

三

民国肇始，不仅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时人的心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曾遭围攻的“西学”在清末新政的浪潮下成为了带有褒义色彩的“新学”，共和制度的诞生更说明中国人追求“新学”没有白费。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晚清的“新学”此时一变而为“科学”，原因有很多，例如，“新学”积累质变成了“科学”；大量留学生带回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知识；“科学”这个词汇本身也在此时输入并被广泛接受。更重要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大量的新科技被用在了战争中，欧洲成了新科技的比拼场。有感于此，1915年1月，一群留美学生在“中国科学社”的基础上，于上海创建了《科学》杂志。同年9月，在袁世凯鼓吹帝制并组织筹安会的紧急情况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开篇《敬告青年》，要求学习欧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并明确提出和政治责任相比肩的青年人的责任——要学“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比如生理方面，反对“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31]在“科学”当道的情况下，“性”概念顺理成章地搭上了“科学”的快车，传播更广。

在1914年至1920年间，与“性”相关的组合词汇越来越丰富，例如“性欲”“性交”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务本女塾毕业生，后来在南洋女子师范任教的吴若安1914年参考杜亚泉的《论蓄妾》一文，从生理谈起，介绍美国医学博士斯配利皮楷氏的“人体四部机关：营养、运动、智识、性欲机关”理论。《青年杂志》发表谈“性欲”的文章《青年与性欲》。有的作者把人类的“性欲”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试图证明地理是影响人类“性欲”的一个重要原因，气温、城乡、人口多寡等地理因素都可以影响“性欲”和人类的文明。[32]还有人讨论嗅觉和“性欲”的关系。作者从下等动物的嗅觉和“性欲”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谈到人类嗅觉对“性欲”的影响。[33]而周作人在1918年的《新青年》中已经相当熟练地使用“性交”这样的词汇了。[34]

“性别”一词也大约在此时出现。笔者以为，“性”的“sex”的来源也许来自日本，但“性别”词汇可能还是来自中国本土。当身体的、生殖的“性”涵义很明确之后，“性”之分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性别”。1917年，《申报》上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现代汉语用法“性别”。在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当中，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叫做《论植物之雌雄性别及其变化》。[35]其实，这一本介绍植物学的科学小册子，在同一年的《学生杂志》上刊载过。作者名叫张石朋，是广东农林讲习所林学科毕业生。这篇长文是非常典型的植物学的通识作品，旨在介绍植物也存在明显的雌雄性别区分，并且用各种实验和数据试图说明，植物在受精时，其受精的结果与雌雄株的强弱有关系。雌性强，则结为雌性；雄性强，则结为雄性。这篇科普文章的“性”不仅已经完全具备了“sex”的用法，而且“性别”一词也完全成型。

要而论之，植物**雌雄性别**之原理，虽未能详明，然据前述之种种实验，必其具有先天的原因，存在该植物体内。殆无可疑。无论一种或一株之植物，皆视其**雌雄两性**之根本的强弱为基础。强性每压倒弱性，而弱性每为强性所压伏。此外，受精时之状态及外围之影响，亦不能谓其与**性别**无关，其原理不惟复杂，且一一应于其场所，而不能一致者也。[36]

作者张石朋并非男女平权的革命中摇旗呐喊的激进分子，《学生杂志》也不过是一份专门给学生一个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阵地。可见，当时张石朋能够在通篇文章中自如地使用现代“性”属的含义，并且已经使用“性别”，说明这个词在五四前后已经为很多普通学生群体所接受了。这一点还可以在当时的其他一些学生读物上找到证据。当时教学生学习英文的文法中就已经明确提到“性别”是将“天然物阴性、阳性分别的方法”。[37]若将这则语法解释和1908年颜惠庆《英华字典》中的解释对比，会发现除了“性别”一词外，其解释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更加具体地列举了哪些属于阴性，哪些属于阳性。可见，“性别”一词是这十几年概念引进、重组的结果。

“性”和它的组合词，成为革命时代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宣扬的内容包括生理决定论，它固化了性别的差异。1915年《青年杂志》发表了孟明翻译的文章，原作者为日本的小酒井光次。小酒井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此时刚毕业不久。他的这篇《人生科学·女性与科学》的文章从低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等生物界的雌虫生殖器问题引出人类的女性问题。他认为，从人体构造、“内脏机关”来看，女性在身体上更接近于儿童。不过，他话锋一转，认为女性身体接近儿童不等于她们“形态不完全”，真正使得男女产生本质不同的是女性的月经和子宫。小酒的这番言论完全继承了19世纪以来西方两性的性征对立的观点。他强调，女子的“性的生活，占女人之重大部分”。[38]

“生理决定论”的科学“性”思想也为本土的西医界的认可。晚清无锡人丁福保早年患病，学习了很多中医理论。后来通过江南制造局的赵元益学到了不少近代医学知识。1909年左右他被派到日本考察医学，回国后除行医外，还传播各种医学新知，并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1915年，他在《中西医学报》上发表《论说·医学上之女性观》，他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古时候的样貌差别没有现在那么大。劳动分工越清楚明确的人种，其男女性差别也越大。丁认为这就是“进化”：

> 非扩张男女间分业之范围不可，若忘此进化基本之分业原理，谓世间之女子，不当立于男子范围之下，是谬论也。盖**女性**为唯一之生殖者，除生殖以外，便失**女性**之价值。又**女性**之身体及精神，受生殖机关之刺戟，而为之动摇，不能为学者或政治家……只可困守家庭，从事育儿，已尽天职。……此种学说，自外表观之，一若侮蔑一切之妇人，细考之，则大不然。[39]

丁还把月经的周期和女性的日常精神甚至犯罪、自杀等行为联系起来，以证明女性的行为完全受其“性”的影响。他从西医学、生理学的权威角度认为女性的价值完全在于其生殖机能，这和小酒井光次的观点如出一辙。

科学“性”概念知识体系还规训了人的“性”活动，宣扬“性”必须受到控制。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杜亚泉的观点，同时添加了大量更加细致、权威的解释。前面提到的吴若安女士将性欲和精力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科学”的梳理。她非常专业地介绍了人体内的各种腺体，比如唾液腺、淋巴腺、甲状腺等等，并一一阐明这些腺体的分泌液对身体的作用。她认为，分泌物对性欲机关影响非常大，尤其对男性。阴囊有外部内部两种分泌的作用，外部分泌就形成精液，而内部分泌就相当于人的精力。如果外部分泌使用过多，内部分泌不足，将会严重影响人的精神，使人“心神沮丧、意气消沉”。因此，从生理上来讲，必须要节制性欲。[40]1916年，孟明再次将小酒井光次讨论“性欲”的文章发表在《青年杂志》上。他借小酒井光次之口，向青年男性谆谆教导：根据生理学的发现，一滴精液，相当于八十滴血液。因此，失去精液越多，意味着失血越多，导致“全身异常，失其水分，血潮渴涸，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内部神经痉挛的紧张。血液冲上头部，为脑病之原因，记忆力减退，心脏鼓动，肺吸微弱，胃肠机能缓慢，起便秘之症”。[41]小酒井劝诫青年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先要从自己个人修身——控制性欲——做起，坚持忍耐之力。

现代“性”概念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异性的、两性对立的“性”。这必须放在更长的历史时空当中才能被理解。晚清到五四初年的“性”讨论很少涉及变性、跨性别等问题，而这在1920年到1949年间是有关“性”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42]“同性爱”概念虽然已经被创造出来，逐渐代替过去的“姐妹情”“断袖之癖”等词汇，却属于“异常”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抵制和规训。[43]从晚清到五四，“性”是固定的，不可变的，男女的身体内不再有“阴阳”平衡。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讨论“性”问题就是讨论男女的恋爱问题、婚姻问题、生育问题。杜亚泉担心的是两性的“性欲”造成子孙的退化。吴若安的担心和杜亚泉大同小异，害怕人类和奶牛一样饱暖思淫欲，发生退化后遗传子孙，造成整个种群的退化。[44]而孟明和小酒井的眼中，女性各种生理上的准备，包括子宫黏膜破损、行经、子宫黏膜愈合等生理的活动，都是为了和异性生育，“保养人类种族”。总之，五四知识分子“性”话语的背后是近代西方二元对立的异性观，同时带有沉重的民族忧患意识。

“性”是必要的、科学的；“性”需要受到控制；“性”还是异性的。以上这些内涵糅杂在一起，会产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生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串联起了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

“性”概念是新文化时期个人主义的基石，也是五四民族主义的基础。“性”如何同时支撑了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看似不能兼容的价值观？罗家伦的观点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疑问。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篇宣扬“男女性”平等的文章中，罗家伦用西方生理学的“性”理论审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男女个体。他那一代的年轻人通过各种生理学术语和图像，已经产生了对自己身体的重新认识——或为男性，或为女性(罗拒绝关心变性或者同性问题)。罗认为，人都是从一个胚胎，经过两性并存，最终发展成两性分明的个体。男性的个体拥有男性的性器官，女性的个体拥有子宫、卵巢、阴道等，并且还有月经和乳汁等生理现象。那么，这样的有独立生理现象、独立需求的个体，应该效忠的是什么？在罗家伦看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体本身，而是为了一个民族框架下的社会：

社会的组织，由于全体的个人，所以社会上的个人皆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没有一个“个人”可以独立存在，也没有一个个人可以独自完善。所以社会的进化，全靠着社会全体个人的完全自由发展。[45]

这一思想几乎是严复于晚清《天演论》提出的思维框架的翻版。严复对斯宾塞的反对欧洲经济集权思想不感兴趣，他的头脑中塞满了中国衰落的困惑，于是把斯宾塞体系中解放了的个体能够催生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一逻辑关系无限放大。[46]从晚清到五四，从严复到罗家伦，这一逻辑基本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是，严复的逻辑与男女无关，或者说他只考虑了男性，而罗家伦的逻辑则包括了男女两个性别。每个拥有“性别”的个体，将自己所有的才智贡献出来，服务于集体主义，服务于社会和民族国家，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振奋的画面，中国焉有不兴之理！

按照这一个人主义的逻辑，家族、家庭这一层面的集体主义被抛弃了，原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已经断裂。严复还尊崇的家族观念和孝道，由于“性”概念横空出世，而遭到了抛弃。陶孟和强调，“男女之别，sex之别也……今之女子，非复一家一族之女子……而系于国家社会之治乱”。[47]个人主义与中国家庭制度不相容。为什么？因为个体不能同时服务于家庭和国家。胡适、戴季陶、刘大白等五四人士指出，如果女子服务于家庭，那么“饮食料理和抚育子女”已经完全占据了女子的全部，女子光满足了家庭的需要，还哪有精力去服务于国家社会？因此，“家庭的解放，最重要是婚姻自由、居住自由、家政自由”、“废除家族制度，尊重个人人格”的呼声成为标配。[48]家庭需要，是女性解放的大敌，也是五四个人主义的大敌。

“性别”成为五四反对家庭制度的动力，还在于它对生理欲望的认可。高举科学大旗的五四人士认为，人人都有“性别”，此为科学“事实”。对科学“事实”的认可，促进人们认可了人的生理欲望。这个时期最为广泛接受的就是每个人有“恋爱”“爱情”的欲望。“性别的两个个体，相须冲动，要求同居”，成为婚姻的原动力。同性恋爱则不在考虑之列。[49]在五四对未来的想象中，青年男女性可以独身，也可以因恋爱而结婚，但其动力都不应当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性别的个体。

对两性生理欲望的认可使得五四抛弃家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与晚清有些微妙的不同。晚清以来，家族、家庭甚至不自由的婚姻制度已经被大加挞伐，比如康有为大同思想中提倡的男女订立契约，废除家庭功能，子女全部“公育”的想法；谭嗣同基于佛教和自由平等理念而反对家庭压迫，另外，晚清无政府主义者“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废婚毁家论思想一时颇为兴盛。[50]但晚清的这些毁家论者所本的思想如大同理想、佛教思想和西方的平等理念都没有触及人类的优生学演化理论。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思想更是因为它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和压迫，绝不会支持五四优生学意义下的“两性”结婚，更不会效忠一个民族国家。

添加了“性”与“性别”的五四毁家论则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造成了严重的恋爱、婚姻问题，而这与民族兴盛需要的优生学价值观相违背。震瀛(袁正英)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借翻译俄裔美籍高曼女士之文,反对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造成的痛苦,特别提到儿童会受到婚姻制度的遗毒。而若以爱情的自由规则行事,则会给孩子带来幸福。[51]玄庐(沈定一)坚决反对父母在内的第三者干预婚嫁,他认可婚嫁是"两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情"和"欲"的前提,从"情""欲"中"产生的子女必定更可爱"。[52]高铦更加直截了当,他宣称从整个生物界来看,在两性当中,女性是中心,是"种属根源",男性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让女性完成异质遗传,从而将进化推进一大步。在生物界,女性"自然持重,用那无上权力的选择,静观男性如着自己在堆里乱争,长的长,短的短,个个不同,从那男女堆里,选择最合意的用来遗传到子孙"。他斥责人类,尤其是中国文明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违背了自然规律。只有两性自由自主选择,才能符合进化的原则。[53]

高铦的连载长文《性择》说明女性的个体自主性是如何被导向了一种集体的、异性恋的、民族主义优生学价值观。白露据此指出,"性"概念承认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生理需要,由此承认了女性的自主性,成为五四女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社会和种族的进化基于女性能够自由地按照她们的异性性欲本能去行事,找到最符合她们的社会生殖的男性。[54]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自主性是极为有限的,按照异性性欲本能行事的个人主义目的已经脱离了个人,转向了优生学意义上的种族进步。

尾声

晚清以来的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男女、阴阳"论与"sex"论之间的差别,前者被认为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理论,后者是经过科学实践的真理,由此引起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概念的全方位调整。例如,有感于儒家文化中男女之间明显的不平等,学者们发现汉语中缺乏指称个人的阴性词汇,这一度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和汉语低劣的证明。19世纪70年代,郭赞生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在《文法初阶》中区分了阴阳性。直到五四前后,"她"字终于兴起,知识分子们试图通过语言的平等创造认识上的平等,最后达到实践上的平等。[55]现代"性"概念的兴起也是为了弥补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抛弃原先模棱两可的"阴阳"论,代之以严谨、直观、基于实验医学的身体两性论。其过程开始于甲午亡国危机和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发展于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中突然加速,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已经趋于完成。20世纪20年代张竞生等人热烈讨论"性问题"只不过是将这个概念广而告之。

"性"的兴起表明中国儒家文化的男女观让位于西方科学、医学指导下的生理两性观,也是以家庭、宗族为本的价值观向个人和民族国家为本的价值观转向的核心环节。从戊戌到五四是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变时期,儒家文化的宗族观越来越遭到批判,个人主义似乎越来越明显。"性"概念楔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个人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层面的认识。然而五四的个人主义充满了悖论,通过规训什么是正常的"性",什么是不正常的"性",什么是有害的,什么又是有益的"性",个人主义的边界大幅度缩小,两性性别差异被固化,人只有两种性别,超出两种性别之外的可能性都被排斥,"性"概念被大大地狭义化了;同时,它强调人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自然属性之上,所有不符合自然属性的行为都是违逆的,不正常的。五四以后,这些"违背自然属性"的行为被异化,国人对其的容忍度愈发降低。应当说,五四建构起了它自己需要的科学观,而摈弃了对它无用的科学。"性"概念的建构就是极好的例子。通过宣扬民族优生学,五四并非真正从科学上阐释了各种复杂多变的"性"现象,而是将它导向了一种民族集体主义。应当说,戊戌开始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五四把它结束了。晚清的喧嚣是散乱的喧嚣,而五四虽然众声也喧哗,有一种声音却越来越响亮了。

注释:

①"阴阳"这一对从属的哲学观念应用于自然界一切互相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对立、依靠又可以互相转化的事物，在西汉时期逐渐从互补的对立走向具有等级性的对立，并且和“男女”挂钩，形成后世熟悉的“阴阳男女”体系。参见 Lisa Raphals, *Sharing the L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167—168。

②班昭：《女诫七篇》，叶玉麟选注《历代闺秀文选》，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8页。

③陈宏谋：《教女遗规·卷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子部第951册，第65页。

④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21—222。

⑤ Matthew H. Sommer, "The Gendered Body in the Qing Courtroom", *Journal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2, No. 2(2013), pp. 281—311.“妇”和“女”在古文中有一定区别，“妇”为已婚女子，“女”多指未婚女子。清以后“妇女”一词大为增加。但这些词都指称父系家庭中的女人。见牟正蕴：《解构“妇女”：旧词新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6期，1998年。

⑥Thomas Lan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⑦Chandak Sengoopta, *The Most Secret Quintessence of Life: Sex, Glands, and Hormones, 1850-195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⑧合信氏：《全体新论》卷10，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第2—4页。原版为1851年清道光潘仕成辑刊海山仙馆丛书本。清末还有许多介绍西方卫生、生理学的著作，也有不少是清人所作，但这些著作并未采用“性”概念，也并未受到“科学”的对待。除了少数精英推崇它们，大多数人将其视为“淫书”。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清末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及其读者》，《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3页。

⑩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陈雁：《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复旦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但陈雁认为，这些词汇不仅仅是从日本传过来，而是一种综合的结果。

⑪ Leon Antonia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m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 Vol. 22, No. 3(November 1, 2010), pp. 603—628。

⑫白露认为“妇女”和“女性”等词汇不同，尤其在党的词汇中，“妇女”是革命的自我主体，而“女性”则被情欲化、资产阶级化，见 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8。笔者认为在五四时期，“妇女”和“女性”等词一样，含有生理的群属意义。

⑬ Leon Antonia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m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 Vol. 22, No. 3(November 1, 2010)p. 617。

⑭鲁迅：《人生象敦》，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

⑮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New York: Appleton, 1915。

⑯查尔斯·达尔文：《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立花铣三郎译，东京经济出版社1896年版。其“种源论”之称后来成为众多中国读者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早期称呼。1902年《新民丛报》上马君武介绍达尔文的学说时，即称呼其为“种源论”。又经过各家报纸杂志转载，“种源论”之说便传播开来，成为和严复在1898年《天演论》中介绍的达尔文《物种由来》之称并驾齐驱的译法。一直到1921年，还有人在用“种源论”指称达尔文的著作。

⑰查尔斯·达尔文：《种之起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の原理)》，丘浅治郎译，东京开成馆1905年版，第140—142页。

⑱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清议报》1900年第37期，第3044页。

⑲福泽谕吉：《东洋学说·男女交际论》，《清议报》1900年第38期，第2485—2492页。

⑳福泽谕吉：《译论·男女交际论》，张肇桐译，秦毓鎏校，《女子世界》第2卷第6期，1907年。乐怀璧认为1900年福泽谕吉的译文中已经有“性”的说法，在笔者看来是不合适的。Leon Antonia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m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 Vol. 2, No. 3 (November 1, 2010)p. 612。

㉑金一：《女界钟》，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㉒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宋少鹏的看法，但更强调它的新词义。见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㉓翟本瑞：《中国人“性”观初探》，《思与言》第33卷第3期，1995年。另见叶德辉：《双梅景阁丛书·素女经序》，长沙叶氏1903年刊；Leon Antonia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 *Gender and History*, Vol. 2, No. 3(November 1, 2010)pp. 603—628；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㉔W. W. Yen(颜惠庆),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m dard Dictionary*(英华字典),上海商务出版社1908年版,第993页。"Gender"的英语词义不断变化。20世纪初的英文中,它只是一个与男、女或其他形容词相连的词缀,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至今。颜惠庆在此处使用的是它的词根。它在美国第二次、第三次妇女运动的大潮中才被使用来专门表达社会、文化构建的"性别"。20世纪90年代,"Gender"被翻译成中文的"社会性别",以区别于中文中已有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所以难以融入"性别",是因为后者经过五四的洗礼,其"科学""真实"的生理观已经深深渗入中文思维,从而否定了科学也是一种建构。

㉕转引自Lydia Liu, Dorothy Ko, Karl Rebecca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4—17。

㉖《论近日教育上急宜改良之要点》,《申报》1909年9月11日,第3版。

㉗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杜亚泉卷》"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㉘杜炜孙:《理科小识:雌雄性分别之原因》,《东方杂志》第6卷第5期,1909年。

㉙杜亚泉:《论蓄妾》,《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1911年。

㉚《家花植物》,杜亚泉等编《植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初版,1933年缩版,第11页;《鸟之肾及生殖器》,杜亚泉等编《动物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0页。仅举两例,其余散落两部辞典各处。

㉛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

㉜海辑录:《地理与人类之性欲》,《进步》第10卷第3期,1916年。

㉝顾绍衣:《嗅觉与性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5卷第9期,1918年。

㉞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周作人译,《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年。

㉟此则广告在《申报》上刊登了两次,见《申报》1917年5月13日,第2版;5月20日,第1版。五四时期的"性别"概念被认为是"科学""真实"的,与21世纪以后学术界和女权主义者使用的"性别"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了,后者被认为与"社会性别"一样,是人为建构的概念。

㊱张石朋:《论植物之雌雄性别及其变化》,《学生杂志》第4卷第5期,1917年。

㊲《初级英文学生之友:应用文法:性别》,《中华英文周报》第3卷第26期,1920年。

㊳小酒井光次:《人生科学(一)·女性与科学》,孟明译,《青年杂志》第1卷第4期,1915年。

㊴丁福保:《论说·论医学上之女性观》,《中西医学报》第5卷第10期,1915年。

㊵吴若安:《民族之向上依性欲之节制而得》,《妇女时报》1914年第5期。

㊶小酒井光次:《人生科学(二)·青年与性欲》,孟明译,《青年杂志》第1卷第5期,1916年。

㊷Howard Hsueh-Hao Chiang, "The Conceptual Contours of Sex in the Chinese Life Sciences: Zhu Xi(1899-1962), Hermaphroditism, and the Biological Discourse of Ci and Xiong, 1920-1950",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Issue 3(2008), pp. 401—430。

㊸Tze-lan Deborah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4;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3。

㊹吴若安:《民族之向上依性欲之节制而得》,《妇女时报》1914年第5期。

㊺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期,1918年。

㊻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页。

㊼陶履恭:《女子问题:新社会问题之一》,《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

㊽胡适、汉民、仲恺、蒨玉、大白、季陶、仲九、玄庐:《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星期评论》1919年第8期,第1版。

㊾冯飞:《妇人问题概论(续)》,《妇女杂志》(上海)第7卷第3期,1921年。

㊿洪喜美:《五四前后废除家族与废姓的讨论》,《"国史馆"学术集刊》2003年第3期。

(51)高曼:《结婚与恋爱》,震瀛译,《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

(52)玄庐:《婚嫁问题》,《星期评论》1919年第27期,第2版。

(53)高铦:《性择》,《学艺》第3卷第5、6、7期,1921年。

(54)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pp. 78—87。

(55)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11、155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